

当前中国文学取得了多方面的创作成就。但是,也存在一些明显的问题。

下面以近20年中国文学为研究对象,以文学症候为研究视角,以文学病理学为分析方法,探析近20年中国文学。

日常审美：简淡的“日常”与庸懒的“审美”

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作家一头跌入世俗生活的日常写实中。谈恋爱、办婚礼、过日子、生小孩、洗尿片、订牛奶、锅碗瓢勺、扯皮打闹……“活着”,“过日子”,成为池莉、刘震云、张欣、苏童、刘恒等作家共通的文学叙事方式。对于此种状态,文学批评家将它命名为“新写实”,文学理论家借用后现代主义话语,将它定义为“日常生活审美化”。的确,文学的“日常生活审美”,体现出文学与“个体再生产要素的集合(自我生存和后代繁衍)”的当代理念相关,显示出文学“关切解决‘个人’在其环境中面临的问题的思维”,相对此前中国文学的宏大叙事而言,“新写实”文学“非神圣化”的某种后现代主义美学属性表现明显。但是,一种文学现象的新质,并不能掩盖它与身俱来的一个主要问题:仅有“日常”而缺乏“审美”。

一是“唠叨话语”。“唠叨话语”从语义学层面剖析,它实际上是语言的简单性重复,是语言的自然性显现。它的话语形态是简单。简单的背后,显示的是话语使用者对文学语言多功能的放逐与无为!当一个民族的文学作家大多以“唠叨”作为自己的文学语言,当一个民族的文学阅读皆沉溺于简单而自然状态的“唠叨”审美之中,这不能不是一个“问题”。文学语言曾经形成且应该具有的人性雕刻力、审美表达力以及话语张力感和个体经验性,统统消逝殆尽。余下的,只剩下幼稚式的呓语与老妇般的唠叨,这不能不是中国作家们在文学语言方面显露出的无为与无能。虽然,文学话语与日常话语同源,但是,“文学话语又时时制造一种美学分裂,它企图挣脱日常话语,从而葆有一个日常话语无法企及的语言空间”。

二是日常叙事文本的直线叙事方式。自然时间观,支配着近20年中国文学日常叙事方式。人的日常生活程序,人的现世生命过程,故事的发生发展结局,这一类所谓现实生活,真样态,成为作家建构文本的思维方式。文学,仅仅为了“复制”日常生活,或者,成为日常生活的文字版。因此,单向度的直线式叙事方式,成为中国作家们的首选。面对繁杂的“日常”,我们缺乏多样态呈现和立体性构思的“复调”文本,少见从日

常碎片里营造出“瞬间审美”式文学景观的能力,难寻现代作家张爱玲《传奇》、当代作家方方《风景》,那“状人生之态,传人性之奇”的人性表现佳构。即使当今时代,“文学遭到了非神圣化洗礼,但这并不是说文学它被消灭”,从另一角度而言,“这才是真正从事文学的时代”。文学进入“日常”,正应是“审美”从“日常”中流淌与升华。然而,在中国文学世界里,“日常”凸显于前台,而“审美”却流失于“日常”的“克隆”之中,这就是近20年中国文学的症候之一:简淡的“日常”与庸懒的“审美”。

身体叙事：堕落的“身体”与货币化“欲望”

近20年中国文学的另一种状态,是由“女性”、“身体”和“欲望”这三个关键词合成的女性身体写作。“女性”将自我的“身体”置于当代中国文学,是20世纪90年代初的事情。当池莉们热闹地进入市民的日常生活写实时,林白、陈染们正在悄悄地,然而也是偏罩地将女性意识与身体体验及其个人性的隐秘经验置于文学的世界,确立了日后被学术界所认可并肯定的“女性身体写作”。北诺,多米(林白小说女主人公),肖潇,黛二(陈染小说女主人公)们,以女性的心与眼、以女性身体的温热与敞开,以看似放浪实则“优雅而不失尖锐的姿势”,或伫立于“裸窗”前,或穿巡于父子两代的男性情欲世界,或游走于大学校园等“单位”的人事纠葛与痕迹海外那“无人的风口”,或徜徉于“回廊之椅”,品尝着人世的虚浮,女性情爱的虚空与宿命,乃至女性身体的优雅与生命的“枯寂”。然而,这种女性身体修辞学的“胜利”,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潮涌般的商业文化语境中,竟是那样的短暂。继起的女作家棉棉、卫慧们,借用着林白、陈染们用“身体”趟出的文学通行证与学理的合法性,肆意地放大着有关“女人”,有关“身体”快感,有关“欲望”放纵的内核与边界,收获着来自“文学”和来自“市场”的双重利润。在林白、陈染那里,我们欣赏到女性世界的新鲜与深切,触摸到女性作家们精神的标高,那么,在卫慧、棉棉这里,我们看到了“女

当前文学的四种审美误置

□李俊国

性”、“身体”、“性”、“欲望”、“快感”如何按照男性文化意识与货币增值规律等“社会编码规则”,变幻成具有交换价值的文化商品的审美附加值。在“男性偷窥”文化语境中,在以娱乐快感的基本原则的消费主义时代,“身体”之所以被重新占有,依据的并不是主体的自主目标,而是一种娱乐与享乐主义效益的标准化原则,一种直接与一个生产及指导性消费的工具约束”。透过女性身体叙事在近20年中国文坛的突现与流变,我们看到的是文学的“女性”与“身体”及其“欲望”,如何从“致命的飞翔”的精神高端跌落到市井商场的文学事件。

狂欢游戏：“戏谑”的价值误置与“狂欢”的审美错位

狂欢式写作的文学作俑者,一位是王朔,一位是留学海外的王小波。这两位皆不具备“作家”身份资格的写作者,撬动了宏大神圣正经的中国文学板块,开展了一场以睿智而戏谑、调侃而幽默、放纵而狂欢为特征的文学写作方式。但是,好景不再。1994年前后,这场“精神狂欢”的文学景观,瞬间变幻成“游戏性狂欢”的大众文化消费快餐。成为这场狂欢转向的标志性作品,是刘恒的小说《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刘恒为这位生活困顿、一路坎坷的下岗工人张大民,赋予了弃圣绝智、戒除一切“烦恼”、杜绝一切“思想”、善于“贫嘴”、化苦为乐、化悲为趣的“幸福”天赋。这是中国文学的狂欢叙事的一次重要转换。一是叙事对象的转换。狂欢的对象不再是处于社会“上位”的人事,而是城市市民底层的贫弱者。二是价值方式的倒置与审美导向的倒错。此前的作家是对“堂皇”、“神圣”者的揶揄与解构,而刘恒则开始了对卑贱者的嘲弄与玩要。然而,就是这篇充满着文学价值倒置与审美倒错的小说,一旦与影视艺术对接,却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与此相伴的,是影视剧创作的“帝王”喜剧系列;是舞台小品以《赵本山家戏》为代表的“草根”喜剧小品。历史题材《戏说乾隆》《康熙微服私访记》《宰相刘罗锅》《铜铁牙纪晓岚》等影视剧,以游戏、反串、错位、夸张、装玩等后现代大众艺术方式,在快意休闲的

突,道德与历史的冲突,更加激烈而尖锐,90年代的中国都市,更容易引发仅仅凭传统文化精神资源进入都市的中国作家的厌恶与愤怒。像陈应松的“神农架小说”系列,虽然在表现底层山民的愚顽与麻木、沉默而冲动、混乱与贫困、失望而沉痛的生存状态方面,无人比肩,但是,陈应松的底层苦难,统统化为某种情感性的愤怒。“他们的存在是这个社会尖锐的疼痛”,面对苦难的愤怒,极自然地形成作家对底层人格处理的泛道德化模式。“我依然一如既往,热爱农民和下等人,也就是说,热爱我童年接触到的一切,热爱我的阶级”。因此,陈应松赋予底层山民们“善良”品性。凡善良者皆有好运,凡恶毒者皆有报应。苦难底层的人性,被作家作了泛道德化的简单处理。其三,“民间”的想象蓬性漂移。由“底层”拓展到“民间”,开始了中国作家对于民间肆意地想象蓬性漂移。陈应松的故乡是湖北公安,他将自己故乡想象蓬为神秘文化圈“的民间”。作家无力面对现世底层苦难,有意从20世纪中国民族灾难与精神疼痛的现实历史场的精神撤离。如果说陈应松所虚拟出神秘恐怖的“民间”,那么,作家刘庆邦则一度陶醉于温馨而浪漫的“民间”想象蓬。《春天的仪式》,无异于乡间少女怀春的浪漫想象蓬物。刘庆邦的民间,是由朦胧而躁动的“性”,由各色各样热闹繁华的庙会元素所构成。这样的“民间”书写,意在引导读者遗忘贫穷愁苦的现世底层,陶醉于繁冲淡、丽喧闹的庙会“仪式”与人的“性”欲望的双重狂欢。想象性的快意“民间”,成为作家有意冲淡“底层”悲苦的阅读兴奋剂。

“症候”的病理性分析,可以有多种原因,但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作家对于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的书写,缺乏必要的文学应对能力。或者说,文学的精神性能力与文学的审美性能力的双向缺失。近20年中国,作为一个特殊时段,社会转型期的复杂性、丰富性和生动感,应该说,为中国文学提供了一个异常活跃而丰富的社会文化资讯及其生成土壤。中国作家在应对中国社会文化变迁时也进行了多元拓展与多样实践。正因为这种文学的努力与活力,才形成近20年来中国文学蔚然大观的文学面貌。近20年中国,社会文化转型的生动性与丰富性,为中国文学的繁荣,提供了异常活跃而丰厚的文化资源与生成土壤。本文对当代文学的症候分析,目的正在于促使我们的文学创作与研究,更科学更健康地应对当代中国日益繁盛的新时代。

理论观察

云南作家的众多作品是他们的边地意识与民间精神巧妙契合的结果。云南作家将创作的目光投进到边地普通老百姓的身上,以对民间充满亲和力的姿态进入现实语境,这并不是作家躲进象牙塔后的自言自语,而是作家走向民间直接存在,用心灵去直接触摸边地民间存在状态的明智选择。和晓梅的《深深古井巷》引领人们一步步走进具有上千年历史文化积淀的丽江古城,走进映照着纳西族女人美丽倒影并铭记了岁月改变她们的短暂过时的百年古井,走进那些铺着青石板路少妇跨少女穿其一生,恐怕变成苍然憔悴的老女人也走不到头的幽长小巷,走进古朴浑厚的纳西农家小院。碧晖的《龙川怪民三题》突现出一种生机勃勃的民间激情,它包容了对性爱与暴力的迷醉,以狂野不羁挥洒自如的野性生命为其根本,对民间世界给予一种直接的观照与自由的表达。夏天敏的《断头桥》把靠山乡的山民们在贫瘠的红土地上苦苦挣扎的身姿定格在我们眼前,让我们认识了什么才是真正的生命的韧性。小说凝重、深沉而厚实。杨鸿雁的感应异常的敏锐,她从城市人按部就班、千篇一律的冷漠情感生态中,捕捉到了心里长茧的事实,《心茧》既是对女性情感世界的反思,也是对我们每个渐已麻木的现代人的大声质问:你心里长茧了吗?鲁若迪基的组诗《不一样的天空》以充满灵性的笔调,给我们描绘在那一片不一样的天空下,有着不一样的生活,那里的太阳落山,棠梨树下的人与众不同,那里牧羊的地方或划着猪槽船随遇而安的求婚更是令人神往。鲁若迪基把含蓄和明朗、深沉和明快,丰富与单纯相融汇,以特有的高原气质,给人以回味无穷的美感。李学勤的《无法悲伤》通过一群平凡的筑路工人琐碎的日常生活的描写,让我们的心情格外沉重,这也是生活的一种,我们无法拒绝对这种人生状态的访问和思考。艾扎在《红河古渡》里对哈尼人的古老民间文化作了一次全方位的透视和盘点,具有浓厚的古思忆和艺术色彩。周少金的《红颜》里,文化馆拆茅草房盖练功房这种纯属公事公办的政府行为,通过正常的官方途径却行不通,只好改用民间美人计的手段反把事情办成了。在权力的夹缝中艰难寻找出路的小人物的无奈,历历如在眼前。小说一波三折,曲折有致。民间意味的追求,使小说给读者留出了丰富的想象空间。黄玲的《鹤之舞》同样体现出一种民间情结,在喧嚣的都市中受伤、失意的人,潜回民间,在那里找到了自己生活的位置,用民间的雨水洗掉了自己身上的污垢,用民间的真情治好了心灵的创伤。李冲的《倾斜的山峰》是一篇耐人咀嚼的小说。兰花嫁了一个不是男人的猥琐男人阿贵,心里却深爱着高大挺拔,骁勇强悍的男人大山。但在雄奇的鹰嘴峰下,兰花才看清大山也不是真正的男人。倾斜的不是山峰,而是女人心目中的男人形象,高大完美的男子汉形象瞬间轰然坍塌。兰花的舍身救危绽放出了珍贵的民间情意的绚丽光彩,和晓梅的《女人是“蜜”》通篇洋溢着浓烈的巫术文化气息,小说采用双线交织发展的叙事方式,把纳西人的过去、现在、将来融入同一时空,反复透视和反省纳西人的民间文化传统和民族精神世界。让人遐想联翩,人的感情和命运的变化无常,是否冥冥之中真有一个主宰万物的神祇。这就是民间巫术文化的感染和蛊惑作用。可见,云南作家的民间立场就是一种写作立场和叙事态度,知识分子以眼光向下的民本主义思想,关注普通人甚至是小人物的生活内容和生存状态,用“讲述老百姓的故事”作为认知世界的出发点,来表达原先难以表述的对时代以及边地生活的认识。

从民间吸取生活理想是同胞百姓在日常生活中的所表现出来的乐观主义和对苦难的深刻理解联系在一起。李冲的《酒碗里的月亮》以小见大,既描写了赶马人为生计奔波的艰辛,又描绘了他们丰富的内心感情生活,在漫长的旅途劳碌中,每个人都怀揣着一个温馨的希望。《混沌的河》浓缩了一个养路工人“汉子”沉甸甸的一生,让我们清晰地看到,人生并非永远是一股清澈透明的清泉,而是一条四季更替的季节河,它经常泥沙

俱下浊流排空。烟酒茶内,丰衣足食,几乎就是民间的终极理想。和晓梅的《深深古井巷》中,那些走在小巷里轻盈的少女体态,佝偻着腰背的老人身姿,都只是一种表象,隐藏在千篇一律的表象下的是涌动的人欲、复杂的人性、人生的尴尬、生存的困境等,他们被有意无意地压抑、扭曲变形,并被时间轻而易举地尘封掩藏起来,褪尽了本色,失去了原样,以假象欺骗别人,也企图在内心自欺,岁月能冲淡一切,却抹不平常心上的刻痕,只有难言的苦涩永驻心中。杨家荣的《留在廿世纪的女人绝唱》深刻描写了千百年来云南边地通海六一村的女人所遭遇的自缚文化折磨下的苦难,探讨了民间对苦难的承受力和承受态度,写出了苦难重压下民间赖以生存的幽默与乐观主义,挖掘出了长期被主流文化遮蔽的中国民间抗衡苦难的精神来源。

语言是作家创作过程中必不可少的物质媒介,云南作家拿起笨重古拙的方言土语,以边地的语言写边地,不曾想这一试竟写出与众不同的味道来了。一句一个玩,句句有味,充满个性,把一个原汁原味的活生生的边地捧到读者面前。米切若张的《我的母校·我的故乡》大量使用方言土语:“火是瘟奴公,越烤越稀松”“房子盖在山坡上,田地种在山坡上,人和牛羊爬在山坡上,山生得陡,人的命跟着陡峭的苦了”。这样的语言,一句就是一句,土得掉渣,但你无法拒绝它。它那具有穿透力的表达效果,能够穿越时空和民族地域的隔阂,让我们直接触摸到沉缓有力别别跳动的古老民间文化的脉搏。笨拙的方言半通不通,却使读者的生活经验在瞬间被点燃,照亮了沉睡已久的记忆,获得了心灵的交流和文化上的沟通。红河的儿子哥布以母语写诗走上文坛,他的诗惊人的朴素,单纯得令人怦然心动,他的组诗《梯田之光》是真正来自大地的声音。“围绕你的墓穴我走三圈/每一圈喊一声你的名字/阿——爸——伙——斗——”这三行诗反复了三遍,“第一次应答的是一只布谷鸟”“第二次应答的是一只知了”“第三次没有声音应答/父亲,是你生气了吗/往后我该如何辨认那爱我的魂灵”云南作家试图用充满地域色彩和民族性的方言土语贴近现实生活,贴近生态意义上的民间。

现在,爱护环境、拯救地球的呼声不绝于耳。马青的《有关大林莽穿山风与象耳朵的记忆》具有一种自然至上的思想,体现了人类的一种自觉意识和强烈的反省精神。走出“人类中心”,以“生物权利”的眼光来看待自然,人类不再是自然的中心和主宰,更不是自然界至高无上的“孤独一族”,人类与自然界的一切生物,从生命存在的层面上来说是完全平等的,无所谓哪一个高贵,哪一个卑贱,更不存在谁主谁谁的问题。米切若张的《我的母校·我的故乡》是一篇关注人类自身人文环境,关注民间生态的散文。文章采用散点透视的手法,对故乡忽德村进行反复聚焦,宏观纵向上有两次民族融合的叙述,横向上又有山区彝家人日常生活的细致描写,以此揭示了忽德村人们的生命哲学、道德伦理和生存理念。既有历史纵深感,又有社会人类学的哲学高度。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是忽德村的自然生态破坏后,民间的人文生态却得以完好保存,作者是否在告诉我们民间文化的生命力根深蒂固、深入人心?黄尧的散文《北海的一只“鹤鸟”》《“沙尘暴”》不动声色中隐隐透着对生态环境恶化的担忧,最后终于忍不住只好直说了。李约龙的《国门之花》也是一篇关注人文生态的小说,其中最有魅力的部分还是关于景颇山自然风光和民间风土人情的描绘。中国民间有许多闪烁着人文主义思想光辉的独特创造,水的源头总是被演绎为龙的家,不能污染,也不能砍伐周围的树木,否则就会生大病、遭大灾;村寨周围的树木下常常插满了红红绿绿的纸旗,那些被祭拜的神树,没人敢去随便砍伐或破坏,使它们在迷信的诅咒中得到保护,四季长青,长命百岁。在迷信的诅咒和神话传说后面,隐藏的民间古老的生态智慧。

洞 察

学术新见

以进步文艺引领文艺消费

张建国在《高校理论战线》2009年第12期上发表《引导文艺消费与提高国民素质》一文认为,我们要以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进步文艺积极引导文艺消费。这是改善当前中国文艺不合理消费结构的根本途径。在消费一个民族的优秀文艺作品的过程中,人们不仅可以感受这个民族所创造的文明的辉煌,而且能够增强对这个民族的认同感。任何社会成员成为一个家族或民族的一员绝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在文化的熏陶和培养中形成认同的。任何一个民族或国家,都相当重视民族文化的熏陶和哺育作用,尤其要通过优秀文艺作品的传授,培育和弘扬民族精神,激励和凝聚人民。优秀的文艺作品大多是历史上的文艺巨匠从理论上认识整个历史运动的思想结晶。对这些优秀的文艺作品的消费可以帮助人们正确地把握社会的发展方向。在现实生活中,如果人们缺乏对历史发展的正确把握,就很容易为一些短视的“世论”和历史的表象所迷惑。而优秀的文艺作品就可以帮助人们克服这种短视的“世论”,成为具有历史智慧的人。因此,每个时代真正优秀的文艺作品往往成为时代进步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标志,为人们克服艰难险阻、战胜内

书评

荆亚平的学术专著《当代中国小说的信仰叙事》(学林出版社2009年9月版,以下简称《信仰叙事》)对20世纪八十年代以降中国小说中的宗教信仰叙事进行了专门研究,从某种意义上而言,这一研究为审视中国当代文学打开了一个新的维度。

《信仰叙事》选择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文坛上最具信仰诉求写作特征的张承志、北村、史铁生三位作家为研究对象,着力开掘沉淀在几位作家作品中的信仰叙事的审美内涵,从而在学理层面上为构筑当代中国文学写作与终极人文关怀之间的精神联系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信仰叙事是百年来中国新文学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重要命题。从本质上来看,精神观照是文学活动的内在功能之一,信仰诉求则是文学达成其精神关怀的最高体现,不同时期的文学写作感应着时代的潮流而呈现出不同的信仰追求。“五四”时期,冰心、王统照等作家以其对“爱”与“美”的表达而试图引导“梦醒了却无路可走”的青年一代走出精神迷惘的境地;20世纪30年代兴起的左翼文学则将无产阶级革命理念作为一种强有力的时代信仰体系而予以张扬;由20世纪40年代的延安文学而至新中国成立后的20世纪50至70年代的文学则承继着左翼文学所开创的革命文学传统,掀起了以诉求英雄主义、集体主义为表征的红色信仰叙事热潮,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的“十七年”所推出的以《红

忧外患、创造幸福生活提供强大的精神力量。而正确地消费优秀的文艺作品,就是深切地感受优秀的文艺作品所蕴涵的那种宏伟的“历史感”,吸收深刻的历史智慧。

网络文学与文学传统的断裂

邵燕君在《文艺争鸣》2009年第12期上发表《传统文学生产机制的危机和新型机制的生成》一文认为,在“我时代”的意识形态支持下,在网络产业的商业运作下,YY成为了网络文学的“主旋律”,使类型小说一家独大,也就是说文学功能完全退回到消遣性,这就与“新文学”以来的文学传统发生了断裂。而在无限循环的白日梦中,我们也可以更清楚地看到“网络一代”在宇宙观、世界观、历史观、文化观等诸方面也已与前辈人发生了明显的断裂。这双重断裂中都蕴含着需要警觉的危机。第一,祖国认同的危机。在文化密码传递的过程中,通俗文艺一直比精英文艺更深入人心。《封神演义》《西游记》《三国演义》《说岳全传》《三侠五义》《聊斋志异》以及一系列神话传说、民间故事等,共同建构了中国人的现实世界和虚幻世界,奠定了中国人的神鬼观和价值观。这样一套文化密码的传递,在网络时代被截断了。网络是没有国界的,“网络一代”却是有祖国的,而丢失了文化基因密码,他们将怎样建立国族认同?第二,现实认同危机。第三,人类基本价值认同危机。在电影大片和网络游戏中,对视觉和快感的追求一直在不断突破着人类接受死亡频率的极限,这种麻木的快感又通过网络小说进入文学领域。如果连文学这一领域都被强权逻辑统治,被死亡游戏占领,人类价值观的奠定便会发生重大危机。

信仰守望与当代小说的审美建构

□郭剑敏

《红日》《红旗谱》《青春之歌》等为代表的红色经典作品,对几代中国人的精神塑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涌动于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的伤痕文学与反思文学则高树人道主义的精神大旗,为新时期初期的思想解放潮流确立了新的信仰坐标。可以看到,在中国新文学的发展过程中,作家的文学创作活动一直与时代的精神信仰诉求紧密相连,但时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社会思潮的转型,文学中的信仰叙事开始被世俗化的消费欲望所淹没,信仰诉求在文学创作活动中的渐趋弱化,使得当代文学人文精神的匮乏成为一个问题。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张承志、北村、史铁生等作家的“神性”写作便具有了某种精神守望的意义。《信仰叙事》以此为问题,彰显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文学中的信仰叙事及其精神内涵,这本身便体现了作者强烈的学术担当意识,同时也使得该著在切入点上具有了一种特殊的思想价值。

从研究思路上来看,《信仰叙事》一方面注重对张承志、北村、史铁生等作家的信仰叙事作品本身的意义指向进行深度解析;同时又从叙事学的角度,分析作品的叙述视角、结构、修辞以及文体特征等与作家信仰诉求之间的内在关联。这便使得该著对于中国当代文学信仰叙事的研究不是仅仅停留于命题探讨的层面,而是提升到信仰叙事之于当代文学美学建构的高度而予以展开。也正是这一研究角度的进入,才使得信

本版责编：熊元义